一位虔誠女信徒的故事

蔡孟堅

本文作者民國三十七年一月與朱瑞頤女士新婚攝影。

梅貽琦尋到「小朱」

瑞頤的娘家，是在前清年間，從江蘇揚州遷居天津，遂成天津望族，她的祖父是嚴正不阿而守舊禮教的紳士，乃父朱文衡曾與胡適之梅貽琦等同赴美國留學，相交亦深，返國後因家世篤信基督，無意宦途，而以一生在青年會服務爲職志，任北京青年會總幹事甚長時日，她母親出自與朱府門戶相當的水姓世家，她出生於民國十年十二月十日，那時她母親即患有肺病，四歲時，母親去世，她從小受到祖父嚴格的教養，及她姑母朱學勤女士（王寵惠博士夫人）的照顧，六歲即入天津有名的基督教所創辦的中西女校的小學，因受教師的薰陶，即接受基督洗禮，成爲正式基督徒，隨由小學升入該校女中，因她平素對人和善親切，同學都呼她爲「小朱」，在民國五十年間梅貽琦在台灣任教育部長時，赴美途中，在東京停留數日，探聽他的老同學女兒「小朱」所在，結果在我家中找到她，因此我也不能不稱梅伯伯。王亮老交卸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後，即小住天津，由那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梅貽琦博士，介紹認識她的姑母朱學勤女士，因而結婚，那時亮老任北洋政府與國民黨間倡導南北統一會談的聯絡人，因他早年追隨　總理革命，做過孫總理任南京臨時大總統時的第一任外交部長，後來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他又出任外交部長，斯時瑞頤隨她姑母南遷，住在上海，隨時同赴南京，乃就近轉入江陰一個教會學校，畢業後，仍隨姑母住上海，因母親遺傳的關係，患腸結核，不得不長期休養治療，幸得痊癒，她一向說是蒙上帝憐憫禱告之功，我也無從否定。

廬山初會的眞面目

當她滿了二十歲以後，中日戰爭，逐次醞釀并發生，及至南京失守時，她姑母隨着亮老飛往重慶，把他們在上海法租界馬斯南路私邸，交給瑞頤與亮老之姪女王端容女士（比瑞頤大二十餘歲已去世）留守看管，她們深居簡出的住在法租界，聞那時她們往來的祇有杜月笙夫人梅蘭芳夫人及盧燕（現在好萊塢明星）的母親等，所以其時學會幾曲不能配合胡琴的京戲，等到對日戰爭勝利後，王亮老夫婦返回京滬，她也成爲老小姐，她姑母爲着酬勞她們蟄居上海多年的辛苦，讓她

們到盧山避暑地住幾個月，其時適逢曾追隨過亮老的魏道明夫婦，也在廬山，我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租了一所週末上山度假的房子，即與魏家比鄰，她們常與魏家來往，某星期日中午魏夫人鄭毓秀博士約我午餐，我一進門，鄭博士即細聲告訴我說：「今天約有兩位小姐陪你，一位是王亮老姪女，一位是王夫人姪女，你此時已是獨身漢，我可以為你作媒。」寒暄之後，發現瑞頤文靜有禮，而且口齒清晰，眞有「一見傾心」之感，承告她們方自教會出來，因知她們都是基督徒，我即自我介紹說：「國際基督教青年會總會，這幾天在此（廬山）開會，我分署業務部主任蔡智傳是南昌青年會總幹事，昨天要求我以地主身份招待全體出席人員，這次大會主席，是由一位美國某處青年會總幹事擔任，所以他是我宴會的首席客人，席間勸我信基督教，我不便表示反對，他高興之下，就自侍役剛送至他面前一杯乾淨冷水中，用手指取一滴水，在我前額沾沾，他說：這算我受了洗禮，因此我不介意中做了基督徒，今天遇到你們二位基督徒，豈不巧合。」彼此同感高興，他們因為我已是同道，飯後即把她們在山上的住址寫給我，即行道別，因廬山是清靜避暑聖地，來到山上客人，除了走路散步，看朋友談天之外，實無事可做，何況彼此同是基督徒自可建立往來關係，這是我看到瑞頤的第一次，那時想起從小聽到「不見廬山眞面目」這句話，自從我在民國十九年第一次上廬山晉謁蔣總統時開始，隨後十幾年間，曾先後登廬山二三十次，因山上經常雲霧四起，眞是未曾見到廬山眞面目，但是這次無意中見到一位基督小姐的眞面目，內心深引為幸。

本文作者的夫人蔡朱瑞頤女士早年的相照

結婚前後

那時善後救濟分署正值業務行將結束時期，而廬山山下的九江正趕時間進行防洪築堤的善後工程及創設合作農場等，我常赴九江視察各項工程，聞瑞頤仍留住廬山，通常都利用機會上山去看看她，從此相互認識加深，三十六年十月間，我在出席救濟總署召開的工作結束會議後，乘機經九江返回南昌，因在上海登機前，吃錯了飲食，竟爾在機上全身發癢，痛苦難支，幾欲立即自飛機上跳下來，在九江下機後，決意改上廬山求醫治療，當我乘轎上山時，為着搔癢，忍不住在轎上亂動，轎伕竟警告我說：「旁邊是危險懸巖，先生！你不要命，我們要命。」因此力自控制，趕到廬山，其時已近深秋，山上店舖，多已關閉，更無法找到醫生，祇好跑到瑞頤寄寓之所，求她們作「雪裏送炭」的幫助，她們好似看護婦般的照料我，後用電話托九江警察局長在九江同仁醫院找到一位正要遣送回日的日本醫生，因須利用醫院設備，我祇好下山入該醫院就診，那位醫生用幾千cc鹽水，注入我的血管內，同時又給我服藥，仍讓我上山休養，每隔一二小時，用冰或冰水擦全身皮膚，我自廬山九十四號外國人經營的旅館找到冰塊，但須全身脫光，才能磨擦，這位也講「男女授受不親」的千金小姐，乃代雇一位男僕為我服務，不日癢病漸痊，我急於下山返南昌處理公務，在萬般感謝下而要離開她家的早晨，她一人獨自送我到街口，在這景色優美，而四圍冷靜無人之際，我鼓起勇氣，抱着她來一個吻別，她竟羞答答的未加拒絕，那時我內心高興極了，想到這位小姐將來就是我的終身伴侶已成定局，到了南昌從事公務之餘，時常用長途電話與她通話，因此，相互之間情感益增，某日我通知她，我要上山，她表示想到南昌看看我的住家及兩個女兒（即玲玲芸芸）但聲明要派人當天送她回廬山，我聽到高興極了，次日派一向隨着我的宋士漢（現在台灣經合會任職）上山迎接她，到了南昌見到我的兩個女兒，十分高興，她說：「她是基督徒，願到有兒女的家中，多有機會服務。」那時看到她對我兩個女兒的親切態度，

了解她并無失望之意，當日依照約定送她回廬山，次日我遇曾任過經濟部次長的同鄉劉愷鍾夫人，她向我說：「昨日在火車上看一向隨你的宋君，陪同一位漂亮而且臉上有個酒渦，酷似大明星胡蝶的小姐，是不是你的未來夫人」，我當時笑着作答：「照你的說法，不僅像胡蝶，而且是世界有名歌劇中的蝴蝶夫人嗎？」我當時大嘆保密工作，未能做到澈底。在卅六年底，我的善救分署任務，已近尾聲，正是我們舉行結婚的適當時間，某晚在電話中直接談到結婚之事，她說：「訂婚過程，還沒有經過，」我敏捷的回答：「那天廬山的一吻，豈不是訂婚嗎？」她竟以「大笑」表示同意，其時忽然因公又飛京滬，適斯時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因公過滬，魏已知我與瑞頤行將結婚之事，約我與亦係過滬赴京述職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將軍一同午餐，地點係在他上海范園私邸，正入席間，瑞頤的姑父姑母王亮老王夫人也駕到，入席後，魏舉杯首先宣佈：「今天在座的客人中有一位今後比大家晚一輩，蔡先生與朱小姐即將結婚，特別祝賀」云云，其時亮老夫婦雖然與我初次見面，但事先已有了解，當時也舉杯向我祝賀，這樣一來，不僅使我高興，而瑞頤事後聞悉，也覺得已有家長同意的根據了，隨後決定三十七年一月廿八日在廬山教會舉行婚禮，因值冰天雪地季節，幾乎沒有幾位親友留在山上，僅邀請廬山管理局長吳仕漢警察局長張毓中及由九江趕來賀客張維李培桂等總共客人不過二三十人，在山上九十四號外人經營的飯店，以茶點待客並假該旅館爲新婚洞房，不數日即偕瑞頤赴南昌暫住，在我任職救濟署長期中，江西新聞界一再要求分配救濟物資，因不適合聯合國基本協定，均被聯總外國顧問否決，自然怨在我一人身上，竟借機發新聞造謠，說我在廬山結婚，用了六億法幣，被邀參加典禮的客人讀到該項中傷我的新聞時均大爲不平，我祇有一笑置之。

女兒們重獲母愛

我倆進入南昌四緯路住所時，女兒玲玲芸芸（已故）站在大門口歡迎，大呼「媽媽」，但她們竟向我開玩笑，稱我爲「新郎倌爸爸」，使我感嘆萬分，從此家中有了媽媽，也有主婦，那時兩個女兒，都在南昌基督教創辦的保靈女中肄業，這位教會學校出身的媽媽，每晨照料她倆上學，開始做主婦應做的事，因爲爲着趕辦分署結束，忙個不了，一面派人赴上海，租一住所，到了結束辦完後，我偕瑞頤即經浙贛鐵路赴上海定居，途經贛東廣豐車站，其時任該縣縣銀行經理的三弟竹逸上車與我及新婦嫂見面，匆匆話別，渠竟陷匪區，令我迄今憂傷無已，隨後玲玲芸芸功課告一段落，也來到上海，玲玲仍進原在上海就讀過的學校，但瑞頤爲芸芸找學校轉學，四出奔走託人情，才算辦妥，好在上海爲她久居之地，同時有她姑母關係，多少有些便利，我隨即去南京，那時行政院長張岳軍先生一見我即說：「中央還要你留在江西，先發表你任江西省政府委員」其時使我非常尷尬，好在省府委員，非機關首長，行動較爲方便，是年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選舉總統副總統，我是萍鄉縣選出的國大代表，因而在南京出席會議，斯時王亮老叫我協助孫科先生競選副總統，我不能不賣氣力，那時瑞頤時常來南京看我，接着發現她已懷孕，有了平平，大家雖然高興，但那時共匪愈來愈兇，因覺上海非安全生產之處，黃朝琴兄送自台灣來函促我全家遷台，他願照顧一切，就此我與瑞頤及玲玲芸芸先後赴台，先住北投黃朝琴的別莊，待瑞頤產期臨近時，即入中山北路黃朝琴住宅（現爲國賓飯店）隔壁婦產科醫院，因係第一次臨盆，可稱難產，幸得有名的日本產科醫生迎階接生，及黃家二位夫人協助，得以母女平安，爲着紀念迎醫生與平安出生關係，因此命名「迎平」，平平出生數日後，政府催我赴南昌到職，正值魏伯聰交卸台灣省主席職務一同赴京旋受命出任江西省建設廳長，其時正是徐蚌會戰，共匪作亂，轟動全國，我在這嚴重期間赴南昌就職，而瑞頤在撫育嬰孩之餘，又須照料兩個女兒，不僅日常生活，尤其就學問題，因彼時大陸學生逃來台灣太多，學校擁擠不堪，瑞頤從容安排兩女入學，使我無後顧之憂。

艱難中在臺灣負責成家

我擔任江西建設廳長數個月中，其間曾奉總統命飛往蘭州，作協調西北將領一致抵抗共匪工作，歸程江西已告撤守，瑞頤飛來廣州，迎我一同赴台，開始租住臨沂街，後在青田街自購一房定居，那時王亮老、何敬公、周至公及桂永清、尹仲容先生等常來我家打橋牌，生活一時稍形安定，不過大家多帶着一種前途渺茫的心理，主

要爲着未來生活與安全，我那時手中僅有能夠維持一、二年的最低生活費用，一時誤聽人言，拿去放息，可得二分利息過生活，我不僅自己照做，并勸友好一同拿款存放，由我負責，詎料這一筆共同湊足的小款，存到那家五金行，存款送去不到二十天，即宣告倒閉，店主已先逃往香港，顯然是有計劃的欺騙。我一向不經意生活費用，在這剛剛交卸職務，收入告斷之際竟眼看今後一家數口嗷嗷待哺，受到此種打擊，眞是恨不欲生，縱說個人受騙不管，一家生活不計，而對朋友保證之款，必須負責歸還，那時眞是窮途末路，一面賣了青田街住宅，一面請求政府配給房子，幸得友人協助，配到長春路一幢公家房屋，將賣掉青田街房屋代價，歸還被連累倒帳的友人存款，那事祇有瑞頤一人知道，她力勸我不要告訴兩個女兒，她說：「既然有了公家配房，祇少日常生活費用，相信上帝一定憐憫我們。」從此遷入長春路公家房屋，先辭退下女，每日計算幾元錢買菜，幾元錢作兩女兒上學，這是她與我共患難的一段日子。

從此基督爲我家之主

住進長春路五十二號後，她竟作長治久安的打算，她好像學過室內裝飾，不斷把幾件舊椅子舊沙發，左搬右放的換格調，接着開始與幾個教會牧師聯絡，并作教徒探訪，及奉勸他人信教，我則爲着生活不安，常常外出找朋友談天解悶，有一天我自外面回家，看到客廳牆上掛了「基督爲我家之主」的幾個橫着掛列大字，非常意外，心中認爲我才是這家的主，爲何讓給基督，好在房子是公家的，我也無分文存款，基督能爲我照顧這個窮家，眞是我求之不得，何必爲此與太太爭吵，祇有默認不談算了，自此以後，教會牧師及一般信徒，不斷到我家與瑞頤談論教義，我如在家時，即躲入小客廳內，不聽那一套，殊知瑞頤訂定每週在家中舉行一次家庭禮拜，除約妥遠處教友參加外，并臨時通知附近鄰居太太或老太太們都來我家聽道，有時由教堂牧師來講，有時瑞頤自己講或作見證，我爲着維持家庭和睦，不能不加入旁聽，那時玲玲芸芸似乎聽得起勁，我問她們的感想，她們說：「媽媽信上帝，我們信媽媽。」我內心贊成她們的說法，不過我信的是太太而已。那時她肚子裏正懷着大男孩兆申，她更感謝上帝賜福給我們，我焉能對她不順服，三十九年夏間某日　總統忽然召見我，面示：「有一個重要任務派你去日本主持，你可即作準備。」我感激之下，當陳明我不懂日語，復蒙指示：「祇要你對我（總統）直接負責辦事，談話可帶翻譯人員」這一意外的出國任務，不僅是我一生前途的轉捩點，也是我一家旅行外國的好機會，從此我即作赴日的準備，決定先赴東京，作短期間停留，初步認識環境與了解人事，迨四十年初正式赴任時，機會湊巧與何應欽將軍一同飛東京，他在日本投降時，係我國陸軍總司令，負責遣送二百萬日本俘擄，他係日本人的恩人，日本朝野，大事歡迎，我借機沾光不少。我最初住日本式旅館，某晨自己不愼，弄到瓦斯中毒，死去八小時而復活，因事已成過去，故未函告瑞頤，但她自友人處聞悉，急欲來日探視，因她身懷六甲，我力加阻止，怕她不放心，先叫一個女兒來陪我，那時玲玲正有男朋友，就讓二女芸芸先來，其時正以公家名義，在東京世田谷區下馬町購一住宅，嗣我因公返台，即由芸芸留日看管家務，隨後我帶瑞頤一同來日，她住一短時，即返台等臨盆，這一段經過，她自然稱謝上帝安排。

接二連三作母親

四十一年二月七日，第一個男孩出生，那時正是我曾暗中參加接洽談判的中日和約簽訂前後，我就中日二字合而爲一，即爲申字的意義，乃命名「兆申」，申兒滿四個月後，瑞頤即帶他及玲玲平平一同來日，正式全家長住東京，不過東京地區太大，加上語言不通，初期頗難尋覓教友一同集會，但過一短時，她居然東撞西撞找到一些住在日本的中國教友，再約同這些教友，分別探訪新聽道的人說教，促成華僑教會漸漸發達，住了一、二年後，她竟發起建築東京華僑教堂，亦即現在麻布華僑教會新址，到了四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個男孩又在東京出世，因他生在東京，故命名「景怡」切着生在日京，心向台灣之意，她雖有兩個兒子，仍是不斷做教會工作，而對進日本語學校，則不甚在意，祇能說幾句買菜、問路、乘車的普通日本話，兩個兒子長至十歲左右，一直是日本褓母撫育，滿口日語，不會華語，這事在我二人都有責任，後來我在日任務結束，帶他們回台北上學五年，才滿口國語，並能寫信作文，瑞頤又說這是上帝的安排「在第二兒子

出世一二年間，本來又懷孕了第四胎，香港趙世光牧師爲着來日主持東京華僑基督教教堂落成的佈道大會，函告瑞頤要發動更多的中國人來聽他講道，她肚裏帶着三個月的胎孕，四處奔走，拉人參加，因而小產，過幾天她還睡在牀上，趙牧師竟來電話，要到我家主持家庭感恩禮拜，我這個不虔誠的基督徒，當時自電話中把他大罵一頓，瑞頤硬說這是上帝的旨意，與趙牧師無關，後來她向趙牧師作道歉的表示，現在想想，可能是上帝怕我老年窮困，教養爲難，所以讓我少一個兒女，如上帝有此旨意，我眞要感謝祂。

臺灣日本行走的女傳道

她在東京作教會工作出了名，台灣教會紛紛來信請她返台灣傳道、作見證，因此她常常要求回台灣，我因我們在台北既有住所，讓她多去檢點照顧也好，所以每次同意她回去，她一回去，家中便變成教堂，除在家中舉行婦女集會查經集會外，還有許多教會及家庭集會，都請她去講道，她竟排定每日白天晚上的傳道日程，我有一次拜見蔣夫人，她說：「你太太每週一次到婦聯總會對參加義務服務的各首長太太們講道，人人說講得好，因爲她眞有靈性」，因爲瑞頤未曾告訴我，我在驚異中祇好用「眞的嗎」的語氣作答，有一次瑞頤蒙　蔣夫人邀往總統官邸吃茶，蔣夫人說：「全國婦聯總會有祈禱委員會組織，她（蔣夫人）已聘了十二位虔誠信教婦女作委員，將再加聘你一位（指瑞頤）。」瑞頤當時回答說：「我（瑞頤）并不是認爲第十三是不吉利數字，但爲聖靈做工，不需要名義，何況我常住東京，無法經常在台參加祈禱，謝謝夫人好意」蔣夫人因此了解而作罷，大家都知道我在中國社會中，是個人面最廣的人，殊知最近幾年回台灣，常常遇到各方面的社會人士，尤其軍方首長，當他不認識我時，他就自我介紹，不是說他在那家家庭集會聽過蔡太太講道，就是說他太太在婦聯總會聽過蔡太太講道，她幾乎已爭取了我的交際市場，有一次我乘機返台，遇到有名考古家的台大教授董作賓（已去世）也在機上，因兩週前在東京見到他說住三天就返台，當時問他爲什麼延期兩星期才回台？他回答：「本來無事該留，但我住在成城，一位友人拉我去參加家庭集會，因我五十年前離開教會學校以後，就沒有再去過教堂，祇好以應酬情緒去參加，聽到一位蔡太太講道，并作見證，說得頭頭是道，我心裏有意再回頭信教，因蔡太太每星期來講一次，爲着聽她講道，所以延期兩週，今天才成行。」那時我心裏想到瑞頤雖常說去成城，沒有說過去講道，何況中國人姓蔡的甚多，不一定是瑞頤，祇好對董先生老來「歸主」，大誇讚一番而言他，治我自台再回東京，問瑞頤有沒有去過成城講道，爲何不告訴我？她回答說：「傳道是基督徒的責任，何必告訴別人，她在馬家講道，有位董教授參加，她也見過，您不相信我講道，現在有您的朋友相信，您該學學他」，使得我祇有「啞口無言」的一笑代答。

不分好壞，是教徒都是朋友

我的個性是：明是非，辨善惡，對人說話，總是開門見山，一針見血，發現他人對我作僞或欺騙時，當時加以指責，遇友人有不平事故，立願「拔刀相助」，而瑞頤的個性，與我完全相反，她待人彬彬有禮，遇事看法冷靜，每每說世間無壞人，祇要接受主耶穌，壞人也變爲好人，竟說：「即如現在的蓋世魔王毛澤東，雖秉性兇惡，并受馬克斯主義麻醉，如果他能『放下屠刀』閱讀聖經，誠心仰望上帝，也可『立地成佛』，固然他應接受人間的法律制裁，到他死時，上帝將對他予以赦免。」我總認爲這是謬論，所以我常常說：「上帝是一位不辨是非的濫好人，直到現在，尚不肯誠心崇拜祂，故當我有時受到他人的欺騙或無禮而深加痛恨之際，瑞頤對我常不予同情。」祇是用聖經的話語，對他人「不是處」，加以解脫，而勸我應以愛心原諒他人，當這種不如我意的人再來見我而我拒見時，她竟出面接見，不談論以往一切是非，專說耶穌道理，并請對方去做禮拜，但有時也竟能感動對方，向我表示歉意，終於言歸於好，更有時她聽到我在電話中申斥部屬或與人爭論是非時，她立即去拿起電話分機，接着與對方說好話，并說你們大家不看聖經，才發生這種無必要的爭論，那樣一來，對方與我，都忍氣吞聲，自然相對無言了，她不僅是好基督徒，也可說是好「和事老」，不過我這位太太，當我的朋友來訪時，不問客人地位，祇問是否基督徒，如果客人是基督徒，她願用很久時間陪坐，有時詢及基督社會一切的一切，若僅屬官場人物，她一招呼就跑到寢室去了，我對此

非常表示遺憾。

母愛第一、禱告第一

當她在南昌進到我家時，我以前的兩個女兒（玲玲芸芸）已有十二、三歲，那時她與她們高矮幾乎相等，初時她親切的看待她們，一如姐妹，但對她們飲食起居，上學下學，都照顧週到，遷至上海小住再到台灣之後，她們彼此既多了解而情感亦增，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她對女孩們應遵守的生活上規矩，從此時加指點，多憑聖經中言語，對她們施教，後來一同旅居日本數年，不僅注意她們生活，更注意她們的態度禮節與衣着，一直到她們二人赴美升學以至結婚，總是不斷通信，處處關切，更教她們一些賢妻良母的道理，如遇到她們來信向我有所請求時，總是促我對她們「有求必應」，至於她自己生下來三個子女，因從小到大，頗少分離，她是以慈母的愛，加上基督的愛來撫育，最多是好言責勸，從不打罵，一反我先父先母的嚴多慈少的作風，當我拿舊式教育子女的方法，嚴加責誡時，她總是阻止并且反對，認爲必須用愛心才能感動他們，一直到現在，祇有她順服兒女，不是兒女順服她，也可說，母親與子女相互順服，她把信仰與家教總是混在一起，除每星期日一家人必須一同去教堂聽道外，她每日早晚均要跪在地板上禱告，常叫兒女隨同跪下，祇有女兒迎乎會自動接受基督洗禮，始終誠心誠意學媽媽，兩個兒子晚間入寢前及早晨上學出門時，她要拿着他們的手，一同禱告，次兒景怡雖在台自動參加受洗，回到東京上日本學校後，受同學影響，靈性已算減退，長男兆申一向說他信媽媽，并不信上帝，瑞頤總覺得是她的遺憾，尚有一個故事，順便敘述，即我家住在東京世田谷區下馬町時，不斷有台灣朋友的女兒來日上學而寄住我家，如彭孟緝將軍及唐縱黃朝琴先生的女兒，都住過半年甚至一年，因此房間較爲擁擠，而瑞頤其時無法一人在房間跪着禱告，每日六時起牀，即獨自到客廳跪在沙發旁祈禱，我原不知靈性較深而信仰虔誠的人，每次在祈禱中感動得流眼淚，這是自然流出，有時自己也不介意，但那時有時約見客人，多在早上八九時，每次在客廳見客時發現沙發上有水，疑是貓尿，痛怒之下，囑司機將我家所豢養的貓，用汽車送至東京郊外，意可保持清潔，殊知貓送走之後，沙發上照樣有水，我對日本下女大加責罵，那時瑞頤出面向我說：「不要罵下女，要罵的是我，（指她自己）這水滴是聖靈感動流出來的，我有生之日，不會終止的，」她的一番自白，我因而大爲了解，她當時沒有給我一個侮辱上帝的大帽子，已算感激不盡了，以後她在牀前禱告，淚水全被被單吸收去了。我雖是硬心腸的人，總覺得她信教如此虔誠，上帝應該被感動，特將這一事實記入，也算我對誠心信教的瑞頤一個親身經歷的「見證」。

尚未完全征服的頑固丈夫

我生性是非心太切，面對現實，自我判斷，決不追求渺茫，加以幼時，熟讀四書五經，時以聖賢言語，作爲做人做事的準繩，從事軍政時期，無緣與基督教接觸，到了四十歲後，在廬山與瑞頤認識及結婚時，才開始認識一些基督徒，到了台灣東京，受瑞頤的影響，才去做禮拜，對教堂主要的好感㈠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㈡大家坐下來清心寡欲拋棄俗務。㈢聖經話語，雖然有些部份，昧近迷信，不近人情，但大的方向，總是祛除邪惡，勸人爲善，我每次聽道，總希望講道牧師，選些合情合理，適合人生需要有警惕意義的上帝言語，拿來解釋發揮，讓熟讀孔孟格言的我，得以對照或反省，但每每遇到講道牧師，提到亞當、夏娃的神話以及人是泥土造的，信上帝即可進天堂……在我這個實事求是，并不介意未來進天堂下地獄的人，聽來常生反感，爲此常與瑞頤辯論不完，瑞頤常讓我作禱告，我說：「上帝如眞願救世人，就不必禱告，祂也要自動降福於天下萬人，何況祂聽不懂我的江西口音的國語，您們如敬愛上帝，應該少禱告，體貼祂能有休息時間，現在中國大陸七億人口，不是人人比我們罪孽更深，相信其中必有許多地下基督徒偷偷禱告，爲何上帝不降禍於毛澤東，讓他早死受審判，而使多數人少受些活罪。」瑞頤聽了以後，總是以「侮辱上帝」四個字來責備我，當我在民國四十八年週遊世界時，特意經中東飛往約旦與彼時駐約國陳大使質平訪問耶路撒冷耶穌降生的聖地，到處訪問耶穌的聖跡，首先參觀耶穌降生處及受難場所，當我問到耶穌曾進什麼學校及讀的書，他們一無所知，再問耶穌是不是一如孔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入則孝，出則悌」，他們茫然無語，他們總是解釋說：「耶穌

是神，不能以人間事來衡量。」我認爲耶穌固然是神，既然到了人間，應該留些好榜樣，若祇是憑一些渺茫的話語，形容一些渺茫的希望，對一般面對現實的初級信徒，不免深感失望，而這種失望心理，不是侮辱上帝，而是歸咎於大部份職業說教者，拿破倫臨終時的日記說：「無一事不表示有神的存在，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全數傳教的宗教家，各種不實際形容過火的說法，我若全信，則不誠實，我變爲一個僞君子，適使我犯了侮辱神之愆。」我認爲拿翁的看法，對了解教義不深的人來看，是一針見血的話，我就此要提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在民國五十年當我參加國防研究院研讀時，適瑞頤也同在台北，某星期日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夫婦（他是我四十八年前老長官）約我與瑞頤到他家午餐，但是日上午，瑞頤應萬華附近一個可容千人的台灣語講道的教堂，請去證道，她姑母王寵惠夫人及梅部長夫人，一同乘我的汽車前往，送她們入教堂後，我即借故去黃朝琴家中談天，因瑞頤講國語又要翻譯台語，故延至正午十二時半才告結束，張岳公因囑副官用電話催客時，即知瑞頤是去講道，而我在黃家，當我見到這位虔誠基督徒的老長官表示遲到告罪時，他立即帶笑容的申斥我說：「太太去講道，你爲何不去一同去聽，你眞願意進地獄嗎？」我當時在輕鬆氣氛中說出下面一段笑話：「岳公！前幾年你曾指示我看聖經應先從詩篇、箴言、傳道書等看起，我在日本確照指示看過，似乎適合人情，與聖賢言語相符，但再下去却幾乎迹近迷信，因此中止，我不是不信道，不過信心有緩有急，一如當年德國當政的基督教民主黨黨魁阿特諾，把該黨議員在黨內分爲兩派，一爲急進派，一爲緩進派，因此遇到重要問題時，黨內可以相互辯論，倘我與內子同係急進的虔誠信教，則兩人天天埋頭看聖經，一如坐在教堂，則失去談話辯論的機會，等於過機械生活，所以還是有緩有急爲好，同時我們祇生下兩個兒子，如果夫妻一同照着亞伯拉罕的志願，將兩個兒子一同送去做獻祭的羔羊，我豈不犯了孔子所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罪嗎？若談到地獄，則係未來難測之事，可能地獄中認識的人比較多，大家一同談天，訴說人間掌故，一如我現在國防研究院已是晚間地下講座之一，其中亦有樂趣。」岳公笑着對我回答說：「你這一套童言無忌的話，因我不是牧師，一時無法與你辯解，你太太是這樣虔誠的基督徒，爲何不能感動頑固丈夫，足見信仰要一致是不容易呀！」

張大千先生係我四十年的老友，近年來我們常赴美住兒女家中，與住在卡麥爾藝術城的張大老相距僅二小時車程，當我往訪大老時，瑞頤就說：「巴西教堂女信士曾以爲大老係希腊大主教不算誤會，我看這位道貌岸然的長老，眞是上帝應選擇的寵兒，人稱大千先生是現代的李太白、蘇東坡，我決定跟你去勸他信奉主。」

我告訴她說，張大老與佛教的淵源甚深，故數十年來，以大千居士自稱，因阻止瑞頤向大老傳道，此後她有時與我一同去探訪大老，皆未開口傳教，可算例外。去年耶誕節前，大老自台灣航空寄給我們廿份自繪的聖經雅歌月曆，瑞頤高興萬分，當聖誕節之夕，我家賓客多屬教徒，教徒們爭索此一名貴月曆，但粥少僧多，最後祇用抽籤的方式分配一空。

瑞頤深感滿意，她說這是大老接近救主的明證。

夫妻爭吵多爲人間俗務

我們在廬山結婚以後的一段日子，正值共匪全面作亂，各方告急，而我總有職務在身，很少回家停留一週以上，加以新婚之後，彼此客氣，頗稱美滿，迨遷居台灣後，因我一時情緒不佳，有時無端發脾氣，這位已非新娘的太太，有時不免爭辯，甚至吵嘴，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她邀請在廬山一同避暑的王家老小姐來我家作管家，因她多年前在上海患腸結核時，都是這位老小姐照應湯藥，多少有點感謝她的意思，這位脾氣古怪的老小姐，不但說話囉嗦而且氣度小，處處懷疑他人，她的小話多，是非即多，今天說下女偷錢，明天說我兩個女孩如何不對，瑞頤既然與她有感情，多少聽她播弄是非，我每次聽到她的閒話，就大爲發火，那時弄得我與瑞頤常常吵嘴，及後遷居日本，沒有這位管家老小姐，加之寄居異邦，用有日本下女而且家中經常有台灣好朋友女兒寄住，環境使得我們必須互忍互讓，避免爭吵，不過遇到兒女傷風發燒時，她總是跪着禱告，求神醫治，不看醫生，那種場合，我忍不住發脾氣，并即去找醫生，我在日本負有任務期間，不免時常有外交及僑界宴會場面，她總是不願一同出席，認係人間煩惱，遇到婚喪大事，當我要她

一同參加時，她認爲非教會儀式，多不願參加，這些場面，都造成我倆爭吵機會，但她有一種一般中國太太多數不能比上的美德，即她不私自搜我的口袋，或私自看我的日記簿，及拆閱我的信件，故意找我的錢財與秘密，即使我有時出席日本藝妓館宴會深夜返家，但她開門時，總是說：「我正禱告上帝給予您平安。」并不追詢我所到的場所種種，因她有這種美德，我對自己行動，更加要謹愼檢點。

依信上帝，不計窮苦

她總是說：「我在廬山要嫁您之前，因爲調查您是多年奉公守法的窮公務員，所以才嫁給您，相信上帝一定會照顧我們一家的生活。」所以我們在江西、在上海、在台灣、在日本她從不私自調查我有無其他財產，以及私蓄，也可能她認定這個豪爽坦白，快言快語的丈夫，是不會有私的，結婚後在南昌上海居住的時間甚短，到了台北，因爲發生一次倒帳後，我的家況，已是生活爲難，她知道實情，所以小心謹愼，維持家務，得渡難關，一到日本，她因語言不通，生活環境亦變，加以她有侍奉上帝的靈性，終日注意教會工作，認爲家務是末節，但我每月將領到的薪水袋原封交他，由她掌管家務，她的缺點，不僅不會學日本主婦按月訂預算，按日記帳，她根本就沒有帳簿，認爲錢財爲身外之物，有去就有來，所以把家用弄到每月都是「寅吃卯糧」，因她不遵守我的「量入爲出」原則，實行她的「量需（要）爲出」的做法，我一再發現她這種管家現象，非常遺憾，同時我每次給她家用時，她都說：「感謝上帝」，使我這苦苦籌錢的人，忍氣吞聲，不願說什麼，怕傷感情，從此我祇好自己管理家用，每週固定給她買菜錢，至於水電費用，及特殊開支，均由我直接支付，因她有了「輕財重教」的本性，高高興興讓我主持，她可以多有時間侍奉上帝，所以在這最近七八年間，她除星期日去教會集會外，每週有二次參加婦女會及查經班，同時還不定時探訪新教徒與會一面相識的住院病人，以及電話通知的家庭集會，每次不是做好飯再去，就是趕回來做飯，不論晴雨，她一出門就拿着一把傘，都是乘公共汽車、地下鐵或電車，即是初去的地方，也是照樣，下了車後，用她的似通不通的日本話，東問西問，東找西找，從不花錢乘計程汽車（Taxi）雖然每週我有給她私人用費，她總是省下來爲兒女添置衣物，她在東京買東西，即是價僅日幣幾百元，總是乘地下鐵跑到距離家中二三十站的橫山町的批發市場，去買便宜貨，所以她買的東西，都說不上是上等，這是她不怕辛苦，盡力節省所在，不過我有一筆意外開支，就是電話費，在我個人此時已算退休，很少用電話，但電話費每月總是在一萬元日幣以上，除了兒子早晚與同學通電話之外，瑞頤不論白天晚間，總是用電話與教友聯絡，或電話傳教，一打每每到半小時，東京或橫濱地區都很大，動輒就是長途電話範圍，她拿起電話，就不想到丈夫的電話開支，她現在已赴美安排兒女上學，母子均已離日，這幾個月，一定祇需付以往的四分之一，這是上帝給我眞的「實惠」。

爲什麼都說媽媽好

我是從父嚴母也嚴的家庭中長大的，加以事業心重，常有「大丈夫不爲妻子累」的觀念，所以我的兩個大女兒失去父親的童年愛，我認爲對她們撫育的責任盡到，已算不錯，但自瑞頤進到我家後，先對兩個女兒照應親切，使她們重獲母愛，以後她接二連三生兒養女，對每個兒女，都一一珍愛，不僅注意他們飲食起居，而平日對待親切之情，實屬無以復加，遇到兒女病痛，照料湯藥，寸步不離，三女迎平在東京時，受到日本女同學影響，首先要學彈琴，就買鋼琴，喜歡養狗，就買名種狗，要學騎馬，就給她買乘具，要在家中招待同學或送同學禮物，她都是說一不二，兩個兒子有時要去旅行，我怕他們路遇危險，多數阻止，她總是放任，認爲上帝一定給他們平安，兒子帶同學來家吃飯，談天，甚至住到一二個月，她都照應週到，從他們出生到現在，除拿聖經話語教導外，從不用打罵對付他們，我有時看不過，要對他們或罵或打時，總是忍耐而不實行，因爲恐怕影響到家庭中的「和平共存」，她每次到美國看兩個已婚而且生兒養女的女兒時，她在她們夫婿前面，不僅不擺「岳母」架子，常以祼母式作風，看護外孫外孫女，和他們談天說故事，并贈小禮物，所以他們都說grandma比grandpa好，連兩位女婿都說岳母親切有禮，好過有個性的岳父，橫直我已是老年了，兒女孫輩，看來是多餘的人，所以我願長住台灣日本并常返國外，快樂的過退休生活，願瑞頤的愛心，今後更能普及人間，而且發揚光大。